

# 张炎词在清代的接受与清代词学的建构

黄浩然\*

〔摘要〕 清代初年,以朱彝尊为首的浙西词派,通过词集整理的方式推出张炎,有力地转变了当时的词学风尚。随着雍乾词坛对于张词的接受愈趋全面、深入,张炎的典范意义逐渐形成。嘉、道之际,常州词派日益兴起,清人开始从兴寄的角度审视张词,推动了张炎词史地位的重估。尽管浙西、常州两派的思路和视角存在明显差异,但双方在开宗立派、指引门径方面又存在相通之处。

〔关键词〕 张炎;浙西词派;常州词派;接受;词学建构

康熙初年,以朱彝尊为首的浙西词派,借助《词综》、《山中白云词》、《乐府补题》等词籍的刊行,将过往几乎无人提及的张炎词隆重推出,引发了词坛的热烈反响,一时姜夔、张炎并举,“家白石而户玉田”<sup>①</sup>。然而当常州词派兴起之际,张炎词却遭受到了相当的冷遇。尤其是在周济的《宋四家词选》中,张炎竟然只得到了“才本不高,专恃磨砢雕琢,装头作脚,处处妥当”<sup>②</sup>的评价。不同词派对于同一词人的不同评价,无疑能够集中体现各自词派之间词学观念的差异。而考察清人对于张炎词的接受,无疑可以见微知著,从一个相对具体的视角考察清代词学的演进历程,进而加深对清代词坛的体认。

## 一、浙西词派与张炎典范意义的形成

从宋末元初到清代浙西词派形成之前,张炎词似乎很少能引起词坛的特别关注。在张氏赞赏的《绝妙好词》中,其词只有三首入选,远逊于姜夔的十三首、史达祖的十首、吴文英的十七首。有明一代,自“永乐以后,南宋诸名家词皆不显于世,惟《花间》、《草堂》诸集盛行”<sup>③</sup>。南宋书坊编选的《草堂诗余》成书于宁宗庆元(1195—1200)以前,尚不及收录张炎词作。而明代涌现的多种草堂系列选

\* 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210097。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4YJC751012)、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2013M531378)、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4BZW073)、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阶段性成果。

① 朱彝尊:《静惕堂词序》,曹溶撰:《静惕堂词》,康熙刻本。

② 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644页。

③ 王昶:《明词综序》,《明词综》,嘉庆七年王氏三泖渔庄刻本。

本,包括顾从敬的《类编草堂诗余》、陈仁锡的《类选笺释草堂诗余》与《类编笺释续选草堂诗余》和沈际飞的《古香岑草堂诗余四集》,其选词范围又多不超出《草堂诗余》,所以张炎词在明代几乎湮没无闻。到了清代顺治、康熙之际,尽管王士禛、邹祇谟已经开始留意以前“不显于世”的南宋诸名家词,论词时也会提及姜夔、吴文英、蒋捷、史达祖、高观国,但是张炎仍然游离于王、邹的视野之外<sup>①</sup>。

针对这一局面,朱彝尊与诸同仁试图通过推出一部全新的词选——《词综》,来宣扬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sup>②</sup>的词学观点,进而逐渐消除《草堂诗余》系列选本在词坛的影响。在为编纂选本搜罗文献的过程中,朱彝尊等人既获得了张炎词别集《玉田词》,也获得了收录张词的《乐府补题》,使得《词综》的编纂工作获得了重要的文献支撑。而张炎词引起当时词坛的关注,正是在《乐府补题》刊行之后。康熙十七年(1678)夏,朱彝尊应召入都,参加博学鸿词科,将《乐府补题》“携至京师”。之所以选择《乐府补题》,其主要原因恐怕还是时间问题,毕竟三十卷本的《词综》直到这一年的腊月才刻竣。《乐府补题》是一部成于元初的咏物专集,收录王沂孙、周密、张炎等十四位南宋遗民的三十七首词作。蒋景祁“读之,赏激不已,遂镂板以传”<sup>③</sup>。随后掀起的“后补题”倡和热潮,使得张炎开始广为人知。与此同时,入京之后的朱彝尊发现编纂《词综》时所依据的《玉田词》远非完帙:“顷吴门钱进士宫声相遇都亭,谓家有藏本,乃陶南村手书,多至三百阙,则予所见,犹未及半。”<sup>④</sup>在获得钱中谐所藏的陶宗仪手书本《山中白云词》之后,朱氏就迫不及待地将其“厘卷为八,与诸同志辨正鱼鲁”<sup>⑤</sup>。康熙十八年(1679),龚翔麟将《山中白云词》附刻于《浙西六家词》之后,奠定了张炎词在清代词坛广为流传的文献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在张炎词再度问世之前,以朱彝尊为首的《词综》编纂者和《山中白云词》整理者,已经提前展开了对于张词的体认和接受。在朱氏看来,“词莫善于姜夔”,而“具夔之一体”<sup>⑥</sup>的张炎词,“意度超玄,律吕协洽,当与白石老仙相鼓吹”<sup>⑦</sup>,为日后的姜张并称埋下了伏笔。在其《解佩令·自题词集》中,朱氏更是旗帜鲜明地表示:“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sup>⑧</sup>以此为基础,朱彝尊等人还通过创作来表达对于张词的认可。从张炎受学的陆行直撰有《词旨》,专门拈出张氏的奇对二十三则、警句十三则予以表彰。而朱彝尊也对张炎在字句上的造诣颇为欣赏,其《浙西六家词》本《江湖载酒集》就至少有六处化用了张炎词句。《玉田词》和《山中白云词》的开篇之作《南浦·春水》被誉为“绝唱千古,人以‘张春水’目之”<sup>⑨</sup>,引起了浙西诸家的格外关注,沈皞日、李符、龚翔麟等人纷纷通过追和《南浦·春水》来展现自己对张词的推崇。种种迹象表明,浙西诸家对张炎的追捧并非出自一己的好恶,而是已经成为一种群体的选择。

随着《词综》和《山中白云词》的相继问世,词坛对于张炎接受已经不仅仅限于浙西诸家,以往专注于北宋的词家也开始积极响应。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词洁》的编者先著回顾了当时词学风尚的转变:“四十年前,海内以词名家者,指屈可数,其时皆取途北宋,以少游、美成为宗。迨山中白云词晚出人间,长短句为之一变,又皆扫除秾艳,问津姜、史。”<sup>⑩</sup>在先氏的印象里,康熙十七年前后曾发生过一次深刻的词风转变,其主要原因在于张炎词的“晚出人间”。楼俨的《南村词选序》可以充当这段追忆的注脚,他在总结其师孙致弥的创作历程时指出:“吾师少作《别花馀事词》,全学秦柳,迨后宦

①王士禛:《倚声初集序》,邹祇谟辑:《远志斋词衷》,邹祇谟、王士禛编:《倚声初集》,清初刻本。

②④朱彝尊:《词综·发凡》,朱彝尊、汪森编:《词综》,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0、10—11页。

③朱彝尊:《乐府补题序》,《曝书亭全集》,王利民等校点,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421页。

⑤李符:《龚刻山中白云词序》,张炎撰:《山中白云词》,吴则虞校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67页。

⑥朱彝尊:《黑蝶斋诗余序》,《曝书亭全集》,第453页。

⑦张炎小传,《词综》,第487页。转引自《玉田词》卷末仇远《玉田词后序》。

⑧朱彝尊:《解佩令·自题词集》,《江湖载酒集》卷一,龚翔麟辑:《浙西六家词》,康熙刻本。

⑨邓牧:《山中白云词序》,《山中白云词》,第165页。

⑩先著:《若庵集诗余序》,程庭撰:《若庵集》卷三,康熙刻本。

游京师,始变化于山中白云,所传《梅洪词》是也。”<sup>①</sup>孙氏康熙十七年入都之时,正值张炎词再度问世之际。熟识浙西诸家的孙氏不仅自己师法张炎,而且向弟子极力推荐,楼俨《秋左堂集序》<sup>②</sup>云:“往余在都下,谒松坪先生于古藤书屋,首问作词之法。先生教以当学乐笑翁,因举‘只有空山,近来无杜宇’,叹为文外独绝,并述乐笑警句、奇对,与陆辅之《词旨》互相发明。”类似的现象也出现在杜诏身上。幼时即得顾贞观、严绳孙指受的杜诏,“原本《花间》,熏习乎晏小山、张子野及周美成”,“迨折衷于吾师竹垞先生,又从南渡诸名家变化出之”。<sup>③</sup>在其《三姝媚·朱竹垞先生为余品鹭宋人词有作》中,杜氏盛赞张炎“净洗铅华”,并直接引用朱彝尊《解佩令·自题词集》中的“玉田差近”,显示了他对竹垞推尊玉田的认同。至于上文提到的先著本人,更是对张炎青眼有加。先氏认为张炎词乃“生香真色”<sup>④</sup>,完全契合自己的选词标准,所以,自有词选以来,张炎第一次位列榜首。

尽管张炎词在康熙年间已经获得广泛的认可,但是其词集《山中白云词》的流传范围却相对有限。康熙四十四年(1705)冬,杜诏“奉命分纂《御选历代词》,始得竹垞所寄《玉田词》钞本,时亦未知有‘山中白云’名目也”。直到康熙四十八年(1709)春,杜氏才在修纂《钦定词谱》时得见《山中白云词》<sup>⑤</sup>。不过,这一情况很快就有所改观,从康熙六十一年(1722)曹炳曾城书室刊行龚刻本《山中白云词》到雍正四年(1726)曹氏重印,再到乾隆元年(1736)厉鹗助赵昱重刊龚刻本,《山中白云词》在十五年间至少被刊行三次。而词集的再三刷印也从一个角度表明,张炎在当时已经日益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接受对象,而非先前在《词综》和《乐府补题》中作为特定词人群体的一员。

尽管《全清词·顺康卷》及补编与《全清词·雍乾卷》中均有相当数量的词作关涉张炎,但通过比对,我们不难发现前后之间的变化:康熙年间,词人极少直接提及“山中白云”,到了雍乾年间,“山中白云”在词作中出现的频率明显提高;康熙年间,词人对于张炎的追和极少超出《词综》的选录范围,到了雍乾年间,词坛的追和活动开始更多地转向《山中白云词》。与此同时,集山中白云词的出现也是值得关注的词学现象。与朱彝尊的“集唐人诗句,自一字以至十馀字,铸成小词”<sup>⑥</sup>相比,江昉和仇梦岩则是“通阙只集一人之句”<sup>⑦</sup>,而其中的“一人”正是张炎。尽管集山中白云词难免被视为文人游戏之举,但这一现象本身就颇具意味,至少能在一定程度反映当时词人对于张炎心慕手追的热衷程度。

在编纂《词综》的过程中,浙西词派“发现”并开始对张炎的接受。在《乐府补题》、《词综》、《山中白云词》相继刊行之后,张炎彻底摆脱了以往乏人问津的局面,日益从边缘走向中心,有力地促进了康熙初年的词风转变。随着《山中白云词》在康熙末年至乾隆元年的多次刊刻,学界对于张炎的关注目光更多地从《词综》转向《山中白云词》,词坛对于张炎的接受也因此愈趋全面、深入。这样的接受进程或许相对缓慢,但张炎在康乾词坛的典范意义,已经在浙西词派的大力标举下逐渐形成。

## 二、常州词派与张炎词史地位的重估

嘉庆、道光之际,随着常州词派的逐渐兴起,清人对于张炎词的接受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清代词

①楼俨:《南村词选序》,戴鉴编:《南村词选》,道光刻本。

②楼俨:《秋左堂集序》,孙致弥撰:《秋左堂集》,康熙刻本。

③楼俨:《云川阁集词序》,杜诏撰:《云川阁集词》,雍正刻本。

④先著、程洪:《词洁辑评》,胡念贻辑,《词话丛编》,第1348页。

⑤杜诏:《曹刻山中白云词序》,《山中白云词》,第171页。

⑥钱澄之:《蕃锦集引》,《田间诗文集》文集卷一六,康熙刻本。

⑦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卷一二,《词话丛编》,第3467页。

学也因此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嘉庆二年(1797),被后学追尊为常派先导<sup>①</sup>的张惠言(1761—1802)推出《词选》,倡导“意内而言外谓之词”<sup>②</sup>以推尊词体。所谓“意内者何?言中有寄托也”<sup>③</sup>。在这部于唐宋词仅录44家116篇的选本中,张炎虽然只有《高阳台·西湖春感》一首入选,但该词却因“言中有寄托”而颇受好评:“词意凄咽,兴寄显然。疑亦黍离之感。”相比于浙派传人许昂霄对该词的品评——“淡淡写来,泠泠自转,此境不大易到”<sup>④</sup>,张惠言着眼“兴寄”的词学主张,无疑开启了清人对张炎词接受的全新视角。沿着《词选》的阐释思路,张惠言又“在他去世前的四、五年中”<sup>⑤</sup>手批赵昱重刊龚刻本《山中白云词》。“全书有眉批六十一条,旁批十一条,共七十二条”,着力探求张炎词作的所托之意。由于张炎身为张俊之后,又身处易代之际,所以张惠言关注其中的恢复之意、初服之意和隐遁之意。《词选》评王沂孙《眉妩·新月》云:“碧山咏物诸篇,并有君国之忧。此喜君有恢复之志,而惜无贤臣也。”对于同时代的张炎,张惠言同样留心其中蕴含的恢复之意,其批卷二《长亭怨·旧居有感》“谢杨柳多情,还有绿阴时节”曰:“杨柳绿阴,其犹有恢复之思耶。否则,弃予阴雨之感也。”<sup>⑥</sup>《词选》卷一评温庭筠《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云:“此章从梦晓后,领起‘懒起’二字,含后文情事,‘照花’四句,《离骚》初服之意。”“初服”一词,语出《离骚》“退将复修吾初服”,意为“故将复去,修吾初始清洁之服”<sup>⑦</sup>。这样的解读难免令人费解,不过张惠言本人对此颇为得意,其批卷一《解连环·孤雁》下片云:“芦花伴侣,画帘双燕,指在山不出者而言,明己之必遂初服也。”《词选》卷二评姜夔《暗香·石湖咏梅》和《疏影·石湖咏梅》云:“题曰‘石湖咏梅’,此为石湖作也。时石湖盖有隐遁之志,故作此二词以沮之。……首章言己尝有用世之志,今老无能,但望之石湖也。”<sup>⑧</sup>如果说姜夔和范成大在当时还可以徘徊于“用世”与“隐遁”之间的话,那么张炎在其所处的时代就几乎没有类似的回旋余地了:恢复已根本无望,出山则有违初服,隐遁似乎就成了唯一的选择。卷四《甘州·题戚五云云山图》有“无心好,休教出岫,只在深山”,张惠言批曰:“相招深隐,此玉田本色,故处处及之。”张惠言的种种解读,大大充实了《词选》对于张词“兴寄显然”的评语。

张惠言之甥,后为张氏之婿的董士锡(1782—1831),在嘉庆二年《词选》问世之际从张氏游,“承其指授,为古文、赋、诗、词,皆精妙”<sup>⑨</sup>,可谓张氏词学的嫡系传人。谈及董士锡本人对于张炎的态度时,论者往往囿于周济嘉庆十七年(1812)《词辨自序》,认为董氏“初好玉田”,后在周氏的影响下“益厌玉田”<sup>⑩</sup>。周氏所言恐怕不尽合乎实情,至少董士锡在道光初年所作的《餐花吟馆词叙》<sup>⑪</sup>并非如此。董氏对于宋代词家的标举,基本延续了张惠言的观点,其推崇的秦观、周邦彦、苏轼、辛弃疾、姜夔、张炎“六子”,只比张氏认可的八家少了张先和王沂孙。而更值得注意的,是董氏有关姜、张的论述。一方面,他明确地指出姜、张在宋代词史中的贡献,以“清雅之制”力矫柳永、康与之的“鄙慢之辞”,使得“词品以尊”;另一方面,他也清楚地意识到姜、张在清代词坛上的影响,“浙西六家独宗姜、

①严迪昌:《清词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69—472页。

②张惠言:《词选序》,《词选》,道光十年宛邻书屋刻本。

③况周颐:《词学讲义》,谭新红著:《清词话考述》,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35页。

④许昂霄:《山中白云词偶评》,葛渭君编:《词话丛编补编》,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015页。

⑤徐永年:《张皋文手批〈山中白云〉跋》,徐立编:《徐无闻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147—148页。

⑥马兴荣:《张皋文手批〈山中白云词〉》,《词学》第15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79—287页。

⑦洪兴祖:《楚辞补注》,白化文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7页。

⑧按,姜夔年少于范成大,此乃张惠言望文生义。相关问题的讨论,参见张宏生:《〈暗香〉、〈疏影〉的历史评价与接受策略》,《中国韵文学刊》2013年第1期,第54页。

⑨缪荃孙:《国朝常州词录》卷一九,光绪刻本。

⑩周济:《词辨自序》,《词话丛编》,第1637页。

⑪董士锡:《餐花吟馆词叙》,《齐物论斋文集》卷二,道光二十年刻本。董氏《餐花吟馆词叙》云:“小秋之词主乎清,以跋三长,为之四十年。今五十餘矣,仅六卷耳,而生平游历踪迹具在。余少小秋十年,而为词且三十年,所得亦止三卷。”“小秋”即严骏生,著《餐花吟馆词钞》,生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江庆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34页),故董氏自称“余少小秋十年”。董序作于严氏五十餘岁之时,则必在道光元年(1821)之后。

张”,使得“秦、周、苏、辛之传响几绝”。换言之,董氏“厌”应该不是张炎本人,而是“墨守浙西者”。

一篇序文或许不足以说明董士锡对于张炎的态度,可如果联系到其子董毅(1803—1851)的《续词选》,这一现象恐怕就并非偶然了。道光十年(1830)夏,董毅携所编《续词选》稿本拜访《词选》另一位编者、张惠言之弟张琦。<sup>①</sup>张琦序之云:“《词选》之刻,多有病其太严者,拟续选而未果。今夏外孙董毅子远来署,携有录本,适惬我心,爰序而刊之,亦先兄之志也。”<sup>②</sup>《续词选》对于《词选》所录诸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增选,其中秦、周、苏、辛、姜、张六家分别有八首、七首、三首、二首、七首和二十三首入选。而在对《续词选》进行讨论时,收录数量冠绝两宋的张炎自然是无法回避的话题。通过对比可以看出,董毅是根据《山中白云词》顺次选录张炎词作的。同时,论者也不难从中发现张惠言手批《山中白云词》的身影:其一,董毅所选的词作,大多是张惠言认为有所寄托的,比如他欣赏的《忆旧游·登蓬莱阁》和《甘州·寄李筠房》;其二,董毅对一些词题有所删节,比如《甘州·钱尧道,并寄赵学舟》原作“庚寅岁,沈尧道同余北归,各处杭越。踰岁,尧道来问寂寞,语笑数日,又复别去。赋此曲并寄赵学舟”,这恐怕是受张惠言影响,以为“不过偶然即景则可”,“玉田当不如此不知痛痒也”;其三,董毅没有选录一首张惠言批评的词作,即便是当时公认的名篇,比如“托意浅”的《水龙吟·白莲》。尽管目前尚不能证明董氏父子与张惠言手批《山中白云词》之间有直接关联,但从《续词选》深得张琦之心可以看出,董选确实“渊源张氏,不愧外家宗风”<sup>③</sup>。

“受法”于董士锡的周济,尽管服膺《词选》的理论主张,但在持论上却绝非亦步亦趋,其嘉庆十七年所编《词辨》即“与二张、董氏各存岸略”,有时甚至会提出异议:“近人颇知北宋之妙,然终不免有姜、张二字横亘胸中。岂知姜、张在南宋,亦非巨擘乎?”<sup>④</sup>在他看来,张炎乃是“积穀作米,把缆放船,无开阔手段”,且“只在字句上着功夫,不肯换意”,而“近人喜学玉田,亦为修饰字句易,换意难”<sup>⑤</sup>。为此,他不仅和董士锡一样,将批评的矛头指向学张炎者,而且比董氏更进一步,开始将矛头直接指向张炎本人。道光十二年(1832),周济编成《宋四家词选》以开示常派门径,“问途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以托意见赏于常派中人的王沂孙,开始被推举到“领袖一代”的高度,而过往风光无限的张炎,却在周选中沦为王沂孙的附庸,只有八首词入选,“其他宅句安章,偶出风致,乍见可喜,深味索然者,悉从沙汰”<sup>⑥</sup>。

其实,“玉田之寄托显而易知”<sup>⑦</sup>,否则很难赢得张氏昆仲、董氏父子的认可。因此,陈廷焯并没有继续贬抑张炎,反而调整了批评的调门。一方面,对于深受周济“纠弹”的姜、张,陈氏认为他们与温庭筠、秦观、周邦彦、吴文英、王沂孙诸家一样,均属“表里俱佳,文质适中者”,乃“词中之上乘”;另一方面,陈氏对姜、张也有所轩轻,认为白石乃“纯乎纯者”,而玉田则“大纯而小疵,能雅不能虚,能清不能厚”。与此同时,陈氏还将玉田本人和师法玉田者作了区别对待,认为后人“师玉田而不师其沉郁,是买椟还珠也”。<sup>⑧</sup>

对于玉田词的“小疵”,晚清四大家之一的况周颐曾作专门分析:“宋人词亦有疵病,断不可学,高竹屋《中秋夜怀梅溪》云:‘古驿烟寒,幽垣梦冷,应念秦楼十二。’此等句勾勒太露,便失之薄。张玉田《水龙吟·寄袁竹初》云:‘待相逢说与相思,想亦在、相思里。’尤空滑粗率,并不如高句,字面稍能蕴

①黄志浩:《常州派词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65页。

②张琦:《续词选序》,董毅辑:《续词选》,道光十年刻本。

③董贻清:《蜕学斋词识》,董毅撰:《蜕学斋词》,民国铅印本。

④⑤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词话丛编》,第1637、1637、1629、1635页。

⑥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词话丛编》,第1643—1646页。

⑦陈匪石:《声执》卷下,《宋词举(外三种)》,钟振振校点,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02页。

⑧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八、卷二、卷三,《词话丛编》,第3968、3908、3834页。

藉。”<sup>①</sup>上述疵病尽管令况氏认为“张诚不足为山斗”，但也不足以掩盖张炎作为宋词名家的“偏精独诣”之处。与况氏同时的朱祖谋编有《宋词三百首》，其中收录六首张词（据唐圭璋《宋词三百首笺注》统计），与张先、秦观、王沂孙诸家大致相当，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视作相关论述的延续。

随着张惠言《词选》的问世，词坛就开始以有别于浙派的角度解读张炎的创作，更多地着眼于其中的“兴寄”。无论是张惠言的手批《山中白云词》，还是董毅的《续词选》，都体现了这一思路。常州词派的核心周济，不满于二张、董氏仍有张炎“横亘胸中”，因而全力“纠弹”玉田。一直到陈廷焯的词话中，张炎才算止住了地位下降的趋势，转而开始获得相对公允的评价。从某种程度可以说，正是常派的全新视角，给张炎的词史地位带来了变化。

### 三、浙、常异同与词学建构

纵观清代词坛，浙西、常州两大词派的此消彼长，构成了清代词学发展史的主要脉络。从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清代之词派，浙西、常州而已”<sup>②</sup>。透过浙、常两派对于张炎的评价，无疑可以管中窥豹，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来审视两派之间的差异与联系。

张炎词之所以能在清初词坛重获关注，与浙西词派的主要思路密不可分。顺康之际，“世人言词，必称北宋”<sup>③</sup>。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时流行的《花间》、《草堂》遮蔽了南宋词的存在，人们已经习惯于“高谈《花间》《尊前》，鄙南宋而不观”<sup>④</sup>。为此，以朱彝尊为首的浙西诸家，试图通过搜集和展示过往被学界忽视的南宋词，“豁词林之耳目，使不蔽于近”<sup>⑤</sup>，从而冲击并最终扭转清初的词学风尚。作为一名热衷藏书的学者，朱氏自然清楚目录之学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所以他创造性地将严谨的目录学操作方法运用到词学研究中。《词综》初刻之际，朱氏在《发凡》中详细列出“已经选辑者”、“虽已览观，未入选者”、“旧本散失，未经寓目，或诗集虽在，而词则阙如”者、“只字未见”者，合计超过两百家。对张炎来说，其词通过《乐府补题》、《词综》和《山中白云词》开始为人所知，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浙西诸家在文献方面的不懈努力。就张氏词集而言，浙派在整理过程中也非常注意相关材料的搜集。《山中白云词》初次刊刻时，李符、龚翔麟分别从戴表元、袁桷的别集中辑得《送张叔夏西游序》和《送张玉田归杭疏》、《赠张玉田》，“因附刻于后，而其生平约略可见”。<sup>⑥</sup>乾隆元年赵昱摹印龚本时，厉鹗又通过邓牧《伯牙琴》中的《张寄闲词序》得知“叔夏父名枢”，进而指出：“功名名偏旁从金，以五行相生之次推之，叔夏于功甫为三世，于循王为五世，与袁伯长赠诗注云‘为循王五世孙’者相符矣。”<sup>⑦</sup>这类材料的不断补充，对知人论世颇有裨益。

与浙西成派时所要应对的局面不同，嘉道年间常州词派逐渐形成之际，良好的文献基础已经在浙派的努力下奠定，且“经过乾隆年间四库馆的开设，唐宋两代的词籍文献已经得到了比较充分的整理”，因此，常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是采取对原有文献进行再阐释的方式来建构其词学论述的”<sup>⑧</sup>。张惠言《词选》的蓝本，“大概是根据朱彝尊的《词综》一书”<sup>⑨</sup>。《词综》卷二四选无名氏《绿意·荷叶》，

①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二，《词话丛编》，第4440页。

②陈匪石：《旧时月色斋词谭》，《宋词举（外三种）》，第212页。

③朱彝尊：《词综·发凡》，《词综》，第10页。

④陈匪石：《旧时月色斋词谭》，《宋词举（外三种）》，第211页。

⑤柯崇朴：《词综后序》，《词综》，第3页。

⑥李符：《龚刻山中白云词序》，《山中白云词》，第167页。

⑦厉鹗：《山中白云词题辞》，《山中白云词》，第168—169页。

⑧张宏生：《〈暗香〉、〈疏影〉的历史评价与接受策略》，第56页。

⑨吴宏一：《常州派词学研究》，《清代词学四论》，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第164页。

张惠言《词选》据以收录并评曰：“此伤君子负枉而死，盖似李纲、赵鼎之流。‘回首当年汉舞’云者，言其自结主知，不肯远引。结语，喜其已死而心得白也。”其实这首词乃是张炎所作，后来张惠言手批《山中白云词》时对《词选》中的阐释作了相应的调整：“此首自寓其意，遗簪不展，当年心苦可知。……‘回首当年汉舞’者，庚辰入都也。彼时惶恐失身，故曰‘怕飞去漫绾，留仙裙褶’。……玉田庚寅之归，西风吹折时也。自此得长啸湖山，故曰‘喜静看，匹练秋光’也。刻《词选》时未见此集，从《词综》作无名氏，所解未当也。”之前被视为“胡牵妄摭”的阐释，在调整之后仍不无牵强。周济《宋四家词选》的情况与《词选》很相近，其所选“皆取之竹垞《词综》，出其外仅二三篇”<sup>①</sup>。周氏亦收《绿意》，并评曰：“《词综》列入无名氏，记见一本作梦窗词，今不记何本矣。”<sup>②</sup>尽管周氏对吴文英极为推崇，但他似乎对这阙词的最终归属并不十分在意，也没有开展进一步的文献考订。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谭献的《篋中词》里，“其书实不得谓之选本，盖其从别集选录者极少，嘉庆以前词，大多从王、黄二家《国朝词综》中抄撮，嘉道以后，多以朋好传钞一二词录存之，几有存人之意。《续集》四卷，皆取资于丁氏《国朝词综补》”。<sup>③</sup>这些盛极一时的选本或许可以表明：对于常派诸家而言，当文献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文献的占有量或许会影响到细微之处阐释的周严性，但尚不足以动摇其理论框架。

当张炎的词作呈现于清代词坛时，浙西、常州两派接受的角度有着相当的差异，前者主要着眼于张词之艺，后者主要着眼于张词之意。当然，这只是就其主要差别而言。包括张炎词在内的《乐府补题》进入清人视野时，朱彝尊就探求其中的言外之意：“虽有山林友朋之娱，而身世之感，别有凄然言外者，其骚人《橘颂》之遗音乎？”<sup>④</sup>浙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厉鹗，也探求过其中的身世之感：“头白遗民涕不禁，《补题》风物在山阴。残蝉身世香莼兴，一片冬青冢畔心。”<sup>⑤</sup>由此可见，张词之意也曾经引起过浙派的关注。只不过浙派推举张炎的目的，主要在于以其“句琢字炼，归于醇雅”，“一洗明代纤巧靡曼之习”<sup>⑥</sup>。因此，从朱彝尊《江湖载酒集》化用张炎词句，到孙致弥“述乐笑警句、奇对，与陆辅之《词旨》互相发明”，再到江昉、仇梦岩集山中白云词，词坛似乎更津津乐道于张词之艺，特别是张炎在字句上的造诣。

针对上述情况，强调“意内而言外”的常州词派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评。谭献曾指出：“《乐府补题》，别有怀抱。后来巧构形似之言，渐忘古意，竹垞、樊榭不得辞其过。”<sup>⑦</sup>谭氏所言，绝非无的放矢。随着“后补题”热潮的涌现，包括朱彝尊在内的参与者逐渐将这种唱和演变为词人逞才斗智的舞台，“益见洞筋擢髓之力”，言外之意就变得相对次要了。厉鹗的六首“后补题”词作<sup>⑧</sup>，除《摸鱼儿·莼》之外，另他五首均有自注来解释相应的典故，以腹笥为词的印记相当明显，言外之意更是难以觉察。至于浙派对张词字句的追慕，陈廷焯针对性地指出：“大抵读玉田词者，贵取其沉郁处。徒赏其一字一句之工遂惊叹欲绝，转失玉田矣。”<sup>⑨</sup>这番颇具忠告意味的词论，是其由浙而常后的切身体会。同治十三年（1874），陈氏编《云韶集》，崇尚雅正；光绪十六年，陈氏辑《词则》，鼓吹沉郁。前后旨趣相异的两部词选，正好折射出浙、常两派在张炎词上关注点的不同。以张炎词集开篇《南浦·春水》为例，《云韶集》评曰：“‘鱼没浪痕圆’五字静细。（下阙眉批）神化之句，碧山《春水》一篇不能及此。

①谭献：《复堂日记》，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99页。

②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词话丛编》，第1657页。

③施蛰存：《北山楼词话》，林玫仪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71页。

④朱彝尊：《乐府补题序》，《曝书亭全集》，第421页。

⑤厉鹗：《论词绝句十二首》（其六），《樊榭山房集》，董兆熊注、陈九思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12页。

⑥陈匪石：《声执》卷下，《宋词举（外三种）》，第200页。

⑦谭献：《复堂词话》，《词话丛编》，第4008页。

⑧厉鹗：《秋林琴雅》卷二，光绪九年泉唐汪氏海边人倚红楼重校刊本。

⑨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二，《词话丛编》，第3817页。

(结句眉批)婉转流丽。”<sup>①</sup>而《词则》评曰:“玉田以此词得名,用冠集首。然此词虽佳,尚非玉田压卷,知音者审之。后半有所指而言,自觉深情绵邈。”随着关注点的转移,张炎与王沂孙的高下之分也因此改变:“玉田词,感时伤世,与碧山同一机轴。深厚微逊碧山。”<sup>②</sup>

从浙西词派到常州词派,其中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那就是两派的代表性人物对张炎的态度近乎迥异。顺康之际,云间词派的宋徵璧,于宋词标举欧阳修、苏轼、秦观、张先、贺铸、晏几道、李清照七家,同时对南宋词也提出论断:“词至南宋而繁,亦至南宋而敝,作者纷如,难以概述。”<sup>③</sup>针对这种在当时颇为流行的观点,朱彝尊不仅提出“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sup>④</sup>的主张,而且还阐明创作立场,所谓“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这句话见于《浙西六家词》本《江湖载酒集》的开篇《解佩令·自题词集》,其产生的背景要远比其内容来得复杂。康熙十一年(1672)《江湖载酒集》成,曹尔堪为之序:“顷与锡鬯同客邗沟,出示近词一帙,芊绵温丽,为周柳擅场。”<sup>⑤</sup>康熙十八年《浙西六家词》本《江湖载酒集》刊行时没有收录曹序,但卷首的李符序并没有反对曹序的观点,只不过进行了一番解释:“集中虽多艳曲,然皆一归雅正,不若屯田《乐章》,徒以香泽为工者。”尽管其中的“雅正”论调已经与《词综》相一致,在一定程度上为朱彝尊作了辩护,但朱氏本人的举措更见成效,以开篇自题词集的方式自铸面目,后人也将之视为《江湖载酒集》的标签,成为概括朱词的经典评语。

不过,当浙西一派的日益风行之时,其弊端也日益显现,“由其以姜张为止境,而又不能如白石之涩,玉田之润”。常州词派的先导张惠言,已经找寻出异于浙派的词学方向考察姜张,“虽町畦未辟,而奥窔始开”。<sup>⑥</sup>推阐张惠言之意、“自树风声”的周济,在《宋四家词选》中大破大立,既批判浙派流弊,又开示常派门径。其对姜张的纠弹,尤具轰动效应,似乎不“骇世”不足以矫枉。其实,“一种学术宗派之建立,必有所标之特殊宗旨,力足以振废起衰,乃能使学者景从,蔚成风会”。<sup>⑦</sup>从这个角度来说,不管是朱彝尊对张炎的追捧,还是周济对张炎的贬抑,从根本上都是出于开宗立派的需要。

随着清代词学的不断发展,浙西、常州两派之间也开始出现互通之处。后人谈及学词门径,往往首先想到周济在道光十二年提出的“问途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也就是由王沂孙入手,经吴文英、辛弃疾以至周邦彦。其实,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后期浙派的重要代表戈载曾在其《宋七家词选》中指引过另外一条门径。是选在嘉庆二十三年(1818)前就着手编纂<sup>⑧</sup>,至道光十七年(1837)方刊行,崇尚“正轨”、“雅音”,收录周邦彦、史达祖、姜夔、吴文英、周密、王沂孙、张炎七家词作。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戈氏有关姜夔、王沂孙和张炎的论述。卷三姜夔词跋云:“白石之词,清气盘空,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其高远峭拔之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真词中之圣也。”卷六王沂孙词跋云:“白石之词,空前绝后,匪特无可比肩,抑且无从入手,而能学之者,则惟中仙。其词运意高远,吐韵妍和。其气清,故无沾滞之音;其笔超,故有宕往之趣。是真白石之入室弟子也。”卷七张炎词跋云:“仇山邨称其‘意度超玄、律吕协洽’,是真词家之正宗。填词者必由此入手,方为雅音。”<sup>⑨</sup>戈载的这三段论述,隐约勾勒出了一条由张炎入手、经王沂孙以至词圣姜夔的学词路数。尽管“戈载与周济的著述中未见有二人交游的记述”<sup>⑩</sup>,但两

①陈廷焯:《云韶集辑评》卷九,《词话丛编补编》,第1601页。

②陈廷焯:《词则辑评·大雅集》卷四,《词话丛编补编》,第2183页。

③宋徵璧:《论宋词》,《倚声初集》卷首之卷二。

④朱彝尊:《词综·发凡》,《词综》,第10页。

⑤曹尔堪:《词原序》,《曝书亭全集》,第41页。曹序云:“往壬寅夏日,与锡鬯聚首湖上,时画船歌扇,午风涤暑,各有诗篇和答。倏忽已十年矣,中间离合不常。”严迪昌指出:“壬寅是康熙元年(1662),‘倏忽已十年矣’,曹尔堪此序乃为《江湖载酒集》而作当无疑”。(《清词史》第264页)

⑥谭献:《复堂词话》,《词话丛编》,第4008、4009页。

⑦龙榆生:《论常州词派》,第434、428页。

⑧沙先一:《清代吴中词派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38页。

⑨戈载:《宋七家词选》,光绪十一年曼陀罗华阁重刊本。

⑩沙先一:《清代吴中词派研究》,第39页。



家开示门径时所采取的逆溯之法却很是相似,可谓不谋而合。后来,陈匪石沿着戈、周两家的思路将浙、常两派的门径融为一炉:“初学为词者,先于张、王求雅正之音、意内言外之旨,然后以吴炼其气意,以姜拓其胸襟,以辛健其笔力,而旁参之史,藉探清真之门径,即可望北宋之堂室。”<sup>①</sup>这样一来,张炎和王沂孙同时成为初学之入门,而浙、常两派的理论关切又同时得到体现。

#### 四、结论

清人对于张炎词的接受,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康熙十七年开始,朱彝尊等人通过《乐府补题》、《词综》、《山中白云词》的刊行,向学界展示过往不受关注的张炎词,有力冲击并最终扭转了“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的词学风尚;第二阶段主要包括雍正、乾隆两朝,随着《山中白云词》在康熙六十一年至乾隆元年间的多次重刊,词坛对于张炎的接受逐渐趋于细致、深入;第三阶段始于《词选》问世的嘉庆二年,张惠言着手以全新的思路来全面解读张炎的词作,其后的周济、陈廷焯诸家继承并发展了张惠言的理论主张,实现了词学视角的彻底转换。前两个阶段是浙西词派从登上词坛到笼罩词坛的历史时期,张炎的典范意义正是在这一时期逐渐形成的。后一个阶段是常州词派逐渐兴起并占据主流的历史时期,张炎的词史地位因为词坛焦点的变化而被重估。由此可以窥见浙西、常州两派在词学思路上的不同:浙派是借助文献的搜集和展示来推动词风的转向,而常派则是借助已有文献的阐释来实现理论的更新;浙派主要关注的是词之艺,而常派主要关注的则是词之意。另外,两派之间的某些相似之处也不容忽视。朱彝尊与周济对于张炎的态度虽然大相径庭,但大力标举和极力纠弹都是基于相似的策略——以一种补偏救弊的姿态开宗立派。而戈载指引的由张炎入手、经王沂孙以至姜夔的学词门径,又与周济的逆溯之法不谋而合。

(责任编辑:陆 林)

### Reception of Zhang Yan's *Ci* Poetry and Studies on *Ci* Poetry in the Qing Dynasty

HUANG Hao-ran

**Abstract:**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Zhexi School of *ci* poetry headed by Zhu Yizun initiated a big transi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ci* poetry through compiling a collection of Zhang Yan's *ci* poems. Zhang's poetry was thus gradually accredited with classical significance since his poems were accepted more widely and profoundly during the Yongzheng and Qianlong periods of the Qing Dynasty. At the turn from Jiaqing Period to Daoguang Period in the Qing Dynasty, Changzhou School of *ci* poetry was formed and began to appreciate Zhang Yan's poe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xingji* 兴寄 (the poetic device to express emotions and thoughts). This further promoted the revaluation of Zhang Yan's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ci* poetry. Despite the apparent differences in their views on Zhang Yan's poetry, both schools shared a lot in how to establish a new poetic school as well as how to create good poems.

**Key words:** Zhang Yan; Zhexi School of *Ci* Poetry; Changzhou School of *Ci* Poetry; reception; *ci* poetry studies

<sup>①</sup>陈匪石:《宋词举》,《宋词举(外三种)》,第8页。